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山西古籍出版社

柳宗元集

王曰... 今... 宗... 元... 集...
六... 王... 宗... 元... 集...
宗... 元... 集...
宗... 元... 集...
宗... 元... 集...
宗... 元... 集...



博学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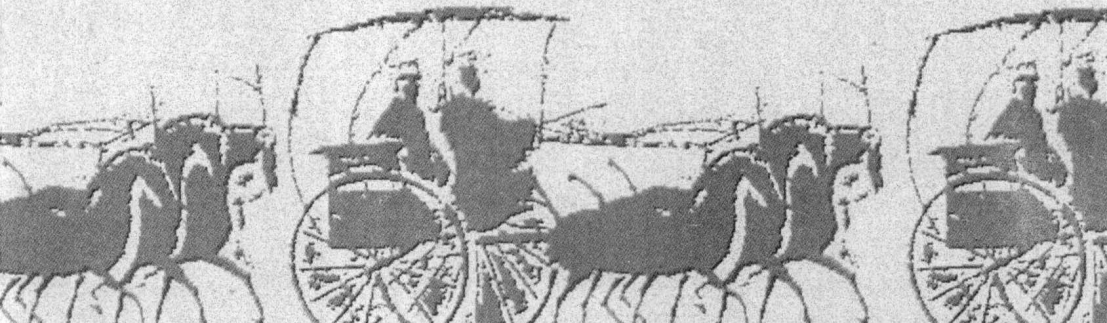
博学工作室

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著

景宏业解评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元集 / 景宏业解评. —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1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ISBN 7-80598-716-5

I. 柳… II. ①柳…②景… III. ①唐诗 - 选集②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唐代

IV. I214.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717 号

柳宗元集

著 者:[唐]柳宗元

解 评 者:景宏业

责任编辑:田潇鸿

出 版 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9

字 数:250 千字

印 数:1-5000 套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00 元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诸子百家卷

- 《诗经》(10.00元) 《楚辞》(7.00元) 《孟子》(9.00元) 《论语·大学·中庸》(9.00元)
《老子》(6.00元) 《庄子》(8.00元) 《荀子》(10.00元) 《韩非子》(9.00元)
《墨子》(8.00元) 《周易》(10.00元) 《孙子兵法·尉缭子·鬼谷子》(10.00元)

名家选集卷

- 《陶渊明集》(10.00元) 《王维集》(10.00元) 《高适集·岑参集》(10.00元) 《李白集》(10.00元)
《杜甫集》(12.00元) 《白居易集》(10.00元) 《刘禹锡集》(10.00元) 《元稹集》(10.00元)
《李商隐集》(10.00元) 《杜牧集》(8.00元) 《韩愈集》(9.00元) 《柳宗元集》(10.00元)
《李煜集》(8.00元) 《欧阳修集》(10.00元) 《王安石集》(10.00元) 《苏轼集》(10.00元)
《柳永集》(10.00元) 《李清照集》(8.00元) 《秦观集》(9.00元) 《辛弃疾集》(10.00元)
《陆游集》(10.00元) 《元好问集》(10.00元)

史著选集卷

- 《左传》(12.00元) 《战国策》(10.00元) 《史记》(12.00元) 《汉书》(12.00元)
《后汉书》(12.00元) 《三国志》(12.00元) 《资治通鉴》(12.00元)

综合选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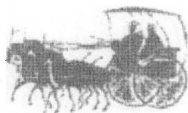
- 《唐诗三百首》(10.00元) 《宋词三百首》(10.00元) 《元曲三百首》(10.00元)
《千家诗》(10.00元) 《古文观止》(26.00元)

笔记杂著卷

- 《蒙学六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格言联璧》(8.00元)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8.00元) 《世说新语》(9.00元)
《菜根谭·小窗幽记·幽梦影》(8.00元) 《曾国藩家书》(10.00元)

戏曲小说卷

- 《元杂剧精选》(10.00元) 《西厢记》(8.00元) 《牡丹亭》(10.00元) 《长生殿》(9.00元)
《桃花扇》(9.00元) 《今古奇观》(20.00元) 《三国演义》(15.00元) 《水浒传》(16.00元)
《西游记》(16.00元) 《红楼梦》(1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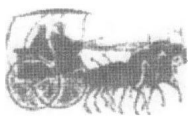
前 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市)。其祖先河东柳氏在南北朝时期为北方著名士族,与薛、裴二姓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元稹《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柳宗元也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

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奭,贞观时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王皇后被疏忌至废,柳奭与诸位元老重臣均遭武则天贬黜,柳氏一族损失惨重。“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柳宗元《送澥序》)。自此之后,柳氏一族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降到普通士族官僚阶层。

柳宗元祖父柳察躬,曾任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令。父亲柳镇明经及第,母亲卢氏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范阳卢氏。官场上的柳镇为人正直,一生为仕途奔波,不过大多是做参军、县令之类府、县僚佐而已。五十岁时,柳镇才调到长安做殿中侍御史,但在处理复杂而棘手的卢岳遗产案时,耿直的柳镇因秉公办理,得罪权臣窦参,被贬为夔州司马。三年后,名臣陆贽出任宰相,柳镇才被召回官复原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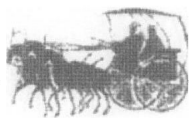
柳宗元十七岁时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两次投考,都没有及第。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同时及第的还有他终生的挚友刘禹锡。当唐德宗听到新科进士柳宗元是柳镇的儿子时,由衷地赞叹了一句:“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进士及第后不久,父亲柳镇就不幸病逝。遵照当时的礼制,他在家守丧三年。丁忧期满后,柳宗元与杨氏完婚。两年



后他又考取了由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九岁时调任蓝田县尉。三十一岁时，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在此期间，他与时任东宫太子侍读的王叔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德宗李适病死。正月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即帝位于太极殿，是为唐顺宗。得到李诵信任的王叔文、王伾等人控制了朝廷大权。柳宗元与其友刘禹锡，由于与王叔文等人的政见相同，更由于他们自己杰出的政治才干，很快便被王叔文、王伾另眼相看，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首的“永贞革新”集团，并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强化朝政，收回利权，加强中央王朝的财权和军政大权，改变贞元年间大权旁落、政出多门的局面；打击弄权的宦官和跋扈的强藩，包括罢除为皇帝侍弄鹰犬、乱政扰民的“五坊小儿”，停罢“宫市”；打击贪暴官吏，进用贤才能士；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废止了当时一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等等。二王、刘、柳的所作所为，对巩固唐王朝的统治无疑是有利的，但支持革新派的唐顺宗在即位前一年的九月已得了中风症，即位后一直体弱多病，不能亲理朝政。再往前追溯，早在德宗皇帝死后，是应该由多病的太子李诵继位还是应该由李诵的继承人顺次即位，当时朝中的斗争就很激烈。王叔文等人力排众议，把李诵扶上台，自然会引起作为李诵继承人——长子李纯的不满，再加上王叔文将李诵扶上台后，预谋排斥李纯，另立太子，这就给革新派种下了祸根。同年七月，太子李纯在朝中部分大臣的请求下担任“监国”，八月，做了六个月皇帝的李诵被赶下台，唐宪宗李纯登基。

宪宗登基的第三天，就开始对革新派人士加以报复。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司户，很快便被杀害；王伾（pī）被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不久也被逼死。九月，革新派的其他成员也被赶出朝廷，先贬为远州刺史，但朝议以为处理太轻，十一月，再加贬诸人为远州司马：韦执谊到崖州（今广东琼山）、韩泰到虔州（今江西赣州）、陈谏到台州（今浙江临海）、刘禹锡到朗州（今湖



南常德)、韩晔到饶州(今江西波阳)、凌准到连州(今广东连州市)、程异到郴州(今湖南郴县),柳宗元则被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在永州所任的职务,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永州当时户不满三万,为中州。据《唐六典》可知,中州司马的官位为从六品下。“员外置”就是编制之外的人员,直白点说,柳宗元其实是个既无官舍,又无具体事务可干的“闲员”。柳宗元任永州司马长达十年,刺史曾五度易人。有姓名可考的刺史是冯叙、崔敏、崔能等三人,还有两位有姓无名。他刚到永州时的刺史是韦某,时值年号改为元和,柳宗元曾为之代笔写过《代韦中丞贺元和大赦表》。

柳宗元的家庭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故。随同他一道前来的年近七旬的老母,经一路凄风苦雨,车船颠簸,到永州后不久即谢世。后来,他又遭遇女儿夭亡以及姐夫崔简的官司,一系列事件对柳宗元打击极大,心情抑郁的他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到永州不过三四年,就“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他私下对亲友倾诉说:“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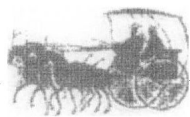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仕途上最大的不幸,但却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被迫离开了政坛,断绝了他“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念头,但同时也远离了无聊的政争,使他能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他被放逐于穷乡僻壤,正当盛年而又无所事事,这对于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无疑是莫大的痛苦,但却有机会了解了下层民众的生活,促使他对人生、对社会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他把深邃的思考结果用精湛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因而在诗歌、寓言、游记以及政论文的写作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元和九年(814),为人公道正直的韦贯之出任宰相,裴度任御史中丞。当时,唐王朝与藩镇割据势力的矛盾日益突出,朝廷内部急需缓和矛盾,采取了一些增强团结的措施,解除了对“八司马”特意规定的“纵有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的禁令,召回柳宗元等五人(凌准、韦执谊已去世,程异此前已调用)。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离开永州奔赴长安。到了长安东郊饯别行人的灞桥时,正是早春二月。他联想到当年被贬出京的情景,无限感慨地写了《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可见柳宗元当时的心情还是不错的,但是,归来后等待他的却是另一场新的打击,实际情形完全不同于他的期望。柳宗元和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二月回京,在长安停留了不到一个月,三月十四日,就被再次出为边远地区的刺史:柳宗元到柳州(今广西柳州),刘禹锡到播州(今贵州遵义),韩泰到漳州(今福建漳浦),韩晔到汀州(今福建长汀),陈谏到封州(今广东封开)。诏下后,极重友情的柳宗元,考虑到刘禹锡有年迈的老母,主动提出愿以条件稍好的柳州对换刘禹锡的播州,后经裴度等人的说情,刘禹锡才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柳宗元仍然去了他的柳州。已经四十三岁的柳宗元,盼望了整整十年的洗雪沉冤的机会,就这样轻易地失掉了。他与刘禹锡一起离京,同行到衡阳后,自己溯湘江西进,沿水路舟行前往柳州,刘禹锡则改行陆路去连州。临分手时,柳宗元写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到柳州后,随同他多年的堂弟柳宗直,因素来体弱多病,不久即去世,终年三十三岁。柳宗直于永贞元年(805)进士及第,因



受柳宗元连累没有做官。他“勤学成癖，攻文致病”，又善书法，“墨法绝代”，喜读西汉文章，编成一部四十七卷的《西汉文类》。柳宗元没有亲兄弟，宗直长期追随左右，二人感情上是很投契的。在《祭弟宗直文》中，联系柳宗直的一生遭际，柳宗元非常悲愤地写到：“仁义正直，天竟不知。理极道乖，无所告诉。”他的另一位堂弟柳宗一，于元和十一年（816）去了荆州，柳宗元曾写《别舍弟宗一》一诗送行。留在柳州一直陪同柳宗元的是好学质重、很有文采的表弟卢遵。

作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留下了许多政绩：一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新唐书·柳宗元传》：“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值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二是身体力行，重视生产的发展。他亲自组织游民，在柳江南岸的大云寺附近开荒种地，倡导柳州人种菜、种竹、种稻、种木。“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记》）。他不但大力倡导发展农、林、牧业，而且自己参加劳动。柳宗元曾在柳州城西北种了二百株柑橘，写下《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一诗，表明自己种柑橘，并不像东吴丹阳太守李衡那样，只为自己私利着想，而是为了贻惠柳州的百姓。三是致力于以文化民。他于元和十年（815）六月到达柳州，十月修复孔庙。“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据《柳州县志》称，柳州人知学自柳宗元始：“有唐柳子厚开此邦之文教。”“建学宫，崇圣教……而乔野朴陋之风一变。”同时，他还亲自以文章教授后学，柳州当地及慕名而来的外地年轻人受过他指点的为数很多。他改变当地人“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伤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而死”（柳宗元《柳州复大云寺记》）的陋习，提倡医学。四是对少数民族采取开明政策。他很注意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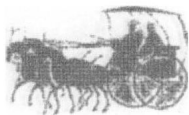


古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华夷偏见。他是最早描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光的一位重要作者，为在文学史中全面反映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和自然风光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柳宗元在柳州勤政之余，也曾忙里偷闲，游历了柳州附近几十里内的背石山、甑山、驾鹤山、屏山、四姥山、仙奕山、石鱼山、雷山等处，写下了《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生动地描绘了当地山川的特异风光。他在柳州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抒发情志的诗歌以及少量的散篇游记。他已不再写那种见解精辟、锋芒锐利的论文或杂文了。在此时期所写的诗歌中，主要表现其久被贬谪的感伤凄苦之音，较少写如《田家三首》、《行路难三首》那样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他的《登柳州峨山》：“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诗中凄楚的思乡之情虽然十分浓郁，但总体说来，语言平和，态度温和，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迫使自己调整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为了使柳宗元能早日北归，长安亲友们曾做过不少努力。但宪宗皇帝对王叔文一派的嫉恨，始终难以改变。柳宗元的好友吴武陵曾参加过元和十二年（817）裴度指挥的淮西平叛，深得裴度的赏识，由于他的不断游说，再加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执政者这才同意召回柳宗元。但宪宗的诏书尚未到达柳州，柳宗元便不幸于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初八在柳州病逝，终年四十七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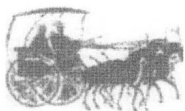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从容沉着地料理后事。他先整理好自己的作品，寄到连州刘禹锡那里。信中说：“吾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柳宗元自己没有兄弟，两个姐姐早已过世，他身后留下两子两女。长子周六，年四岁；次子周七，为遗腹子；两个女儿的岁数稍大，但也未成人。柳宗元生前为官清廉，以至死后家人无力治丧，多亏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孤儿寡母筹措了丧葬费用，表弟卢遵经理其事，才把灵柩运回长安万年县，归葬先祖坟茔。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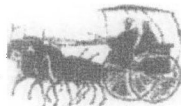
唐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意气风发的时代，唐人的形象思维非常发达，而对偏枯的抽象思维似乎普遍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以一个苦行者的角色，对人们通常难以涉足的哲学思想领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他在《非国语》、《天对》、《天说》等著作之中，系统地阐发了“天人不相预”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对宣扬“天命”的观点给予了批判，发展繁荣了唐代哲学。

“天”是什么？按照神秘哲学的看法，天是神灵，是上帝，宇宙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灵创造的。柳宗元从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彻底否定了上帝神灵说。他在《天对》中的回答是：“晷黑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沌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只是因为“元气”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在他眼里，“天”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不是虚无缥缈的神。“天”是物的天，是客观存在的天，没有意识，没有感知。“天”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关于太阳出没和昼夜变化，屈原根据传说，对太阳出没、昼夜变化提出质疑：“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柳宗元从地动说的观点出发，认为太阳既不“出自汤谷”，也不“次于蒙汜”，它没有升起和没落的地方（“辐旋南画，轴奠于北。孰彼有出次，唯汝方之侧。平施旁运，恶有谷汜”）。太阳的出没，是由于大地在围绕太阳转的过程中，大地对着太阳的时候就是白天，背着太阳的时候就是黑夜。大地绕太阳转是永恒的，从不间断的，不能用里去计算（“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久穷，不可以里”）。据此，柳宗元指出：“明焉非辟，晦焉非藏。”“孰



旦孰幽，缪躔于经。”他驳斥了传说中所谓的白天是打开天门，黑夜是关闭天门的荒谬说法，正确解释了昼夜交替的出现，是大地绕太阳运转的结果。这个认识，是从宇宙本身存在出发认识宇宙，没有掺杂神怪之见，无论是在千年前的唐代，或是科学发达的今天，都不失它的科学光彩。当然，由于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当年柳宗元所说的“不可以里”，今天的人则是可以计算出其距离的。关于月亮的死而复生，屈原质疑说：“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大意是：传说月亮每月生一次死一次，月亮有什么功德本领，能死而复生，它腹中怀着兔子有什么好处？柳宗元更正说，之所以产生月亮死而复生的传说，是因为人们没有弄清楚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是，太阳光强烈无比，当月亮逼近太阳时，人们看不到月亮；远离太阳时，人们处于月亮与太阳之间，就能看到月亮，这就使人感到月亮每月有死而复生的现象。至于月亮腹中的兔子，那是月亮本身缺损所造成的阴影，这种阴影形状像兔子，人们就错误地认为月亮腹中有兔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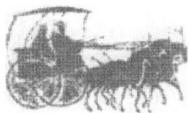
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众多事物中阐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实质。屈原《天问》中有“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柳宗元对曰：“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屈原疑惑不解的是：阴、阳、天三者相互结合，什么是它们的本原？它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柳宗元认为：阴阳的互相融合渗透，是由元气来统一的，是在元气内进行的。元气统一体内阴阳两方面采取不同形式的交错渗透，相互作用，就形成寒暑季节变化，生出万事万物。这是集中体现柳宗元辩证法思想的一个命题。柳宗元把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与自然物质元气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元气化生万物以及自然现象自生自动自变的最终原因。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柳宗元认为，宇宙间各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内部（内因），而不在事物外部（外因）。他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对这一观点作了充分而深刻的表述。从自然界看，“果蓏之自为果蓏，



痲痺之自为痲痺，草木之自为草木”（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从人类社会看，“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柳宗元《天说》）。柳宗元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自己运动，自己停止，自己聚集，自己流散，自己激荡，自己干竭，自己崩塌，自己断裂，自己招功，自己惹祸，并不是为人们打算和安排的，完全是一切事物自己运动规律的表现。这就足以看出柳宗元把世间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出现、成长和消失的极终原因都归于事物内部矛盾诸方既统一又斗争的结果；但同时，柳宗元也不否定外因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影响作用和次要地位。

除以上所说之外，柳宗元还运用辩证法，阐明了生活中许多具体的问题，其识见之高，远远超过前人和同时代的人。比如关于对立双方的转化。柳宗元承认对立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敌可转化为友，友也可转化为敌；祸可以转化为福，福也可转化为祸；害可转化为利，利也可以转化为害。他在《戒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这观点虽源于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但老子只讲到对立双方的转化，没有讲转化的条件，而柳宗元既讲了转化，又阐明了转化的条件。他指出，敌人的存在是祸害，但如果以敌存为警戒，就可以化祸为福；敌人被消灭了，看起来是福，但若“敌去而舞”，忘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就会“敌去召过”，最终导致无法预料的可怕后果。所以他强调要懂得对立双方转化的道理，要掌握转化的规律，以促其转化。“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柳宗元《愈膏肓疾赋》）。这个“在我人力”当然不是主观随意地胡做乱为，而是要顺应客观规律去做。

关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众所周知，原则性就是常规、常理，原则性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坚持原则，不能动摇，但是，又不能把原则性看成僵死不变的东西，要面对现实，从变化了的状况出发，采取灵活的对策，以求实际效果。柳宗元在《非国语·救饥》中，充分论述了这一观点。他批评晋国大夫箕郑用“信”来救饥：“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奚独救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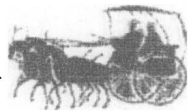
耶？其言则远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岁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人已经困在旦夕，急需救济，箕郑却仍然奢谈施政应讲“信”，实在是只知“道之常，非知变之权”的空谈，迂阔而不切实际。只有针对现实，采取符合实际的变通办法，这才是守常与应变相结合的正确选择。

辩证方法是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把朴素的唯物自然观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更深刻，更具有科学性。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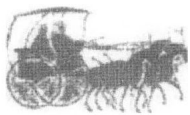
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诗文作品，他的散文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论说文：包括哲学、政论和以议论为主的杂文。柳宗元的论说文，从思想内容看，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哲学、历史、宗教、伦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有所涉及。其突出特点是论证古今，纵横捭阖；敢破传统，立意深远，“识见颇不犹人”（陈衍《石遗室论文》）。如《贞符》、《天说》、《时令论》（上、下）、《守道论》、《六逆论》、《四维论》、《非国语》等。《贞符》动笔于长安，完成于永州。柳宗元写《贞符》的目的，序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批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天命观，阐述自然哲学的“贞符”观。唐家天子到底是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人”？柳宗元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正值宪宗登基之初。他深知其中的利害，但还是表示了“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就是说，如果能够阐明一个大的道理，并施行于人间，即使以自己的死作为代价，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这是何等大胆的议论！柳宗元在文中明确指出：“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唯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帝王受命并不从天，而是从人；美好的符瑞不在于吉祥之物，而在于仁德。只有来自于人的仁德，



而没有来自于天的祥瑞；不是来自天降的祥瑞，才是真正的符信！从来没有丧失了仁德而可以长治久安的，也没有人倚赖祥瑞而延年益寿的。这一大胆卓越的识见，发前人之所未发，言人人之所不敢言。《六逆论》通过《左传》记载的“六逆”之说，阐述了关于任用贤能的观点。柳宗元认为，“六逆”之说中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乃乱之本的说法是错误的。对于人才，只要是“圣且贤”，那么即便是贱、远、新，都应重用；反之，如果是“愚”，无论其如何贵、亲、旧，都不应委以重任。柳宗元的这一立论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山水游记：柳宗元的此类文章均写于被贬之后，以永州之作最为脍炙人口。其中的“永州八记”，即《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奠定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从本质上看，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这不过是柳宗元选择了一种为他的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山水，作为他集中的创作劳动的对象，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而已”（黄云眉《柳宗元文学的评价》）。的确，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具体点说，因为位置的偏远和审美观点的差异，永州山水的美被人忽略、轻视以至于遗忘，这正与柳宗元此时的境遇相同，故柳宗元写永州的山水，不仅在于用被遗弃的山水来反映他自己的见弃，而且在他的行文中还曲折地表现了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批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审美上有三大特色，即绘画美、抒情美和理趣美。绘画美使柳宗元笔下的山水在形与神、客体美和主体美方面得到了和谐统一，从而构成气宕神远、富于诗情的画面；抒情美则展示其忧郁、寂寞和烦躁难安的心灵，在大自然中得到放松和抚慰，从而获得“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乐



趣,进而促使他的思辨能力和审美情趣向更自由、更辽阔、更精微、更独特的境界发展;而理趣美则让他的山水记,蕴含哲理的光华,由此又能探索到他那火热的“忧思而罔极”的心灵所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李育仁《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从山水文学发展的角度讲,柳宗元的贡献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第一,他的山水文学成功地将以往的对山水的平面描写推向了立体描写;第二,将过去的粗线条共性山水描写,推进到细线条的个性山水描写;第三,将以往的山水文学的客观欣赏推向了寓主观感受于客观描写之中。

(三)传记: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尤应注意的是,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大多取材于社会下层。他以非凡的胆识、敏锐的眼光、深邃的笔触,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善良的天性、美好的心灵、聪明的才智。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并把传记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特殊工具,从而对作者自己的政治主张来一番别具匠心的阐释,这在中国古典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换个方式来说,柳宗元根据“文以明道”的原则,继承了传统史传文学借传言志的一面,以现实社会中城乡劳动者作为传主,借以针砭时弊,寄托吏治改革的理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某些作品已经突破了传记文学的一般框架,兼具寓言和政论的特点。

(四)寓言:柳宗元的寓言继承了《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战国策》的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与先秦诸子寓言相比较,柳宗元对寓言文体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在他之前,寓言大抵只是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用作论说的例证,考虑到文章结构的整体性和逻辑性,作者不允许行文过程中有添枝加叶的现象,因此,先秦诸子寓言的篇幅都非常短小,情节也异常简略,虽然这些寓言大多很精彩,也很深刻,但这些依附于鸿篇巨制中的片断,文学性却往往稍有欠缺。